

第一章 章太炎儒学思想的 学术渊源

章太炎儒学思想是近代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不仅有着坚实的社会基础，而且有着深远的学术渊源。考镜章太炎儒学思想的学术渊源，理清章太炎儒学思想的来龙去脉，对其有一个宏观的历史把握，有利于我们把研究推向深入。择其要者而言，章太炎儒学思想的学术渊源不外乎以下两大方面。

第一节 承接传统儒学之统绪

章太炎儒学思想是对传统儒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其中明末清初以来的儒学思想与章太炎儒学思想的形成关系最为直接、密切。

一 清初诸大儒的经世思想

1923年梁启超在其《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曾写道：“最近三十年思想界之变迁，虽波澜一日比一日壮阔，内容一日比一日复杂，而最初的原动力，我敢用一句话来包举他，是残明遗献思想之复活。”用“残明遗献思想之复活”来“包举”章太炎儒学思想的成因，未免偏执一端，失于周全。但如果对梁氏的论断稍作修改，说明清之际诸大儒的思想特别是经世思想对章太炎儒

学思想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启迪激发作用，则是成立的。就最初思想变化所起的推动作用而言，“残明遗献”可以说是章太炎儒学思想的主要源头之一。

第一，强烈的民族意识。在顾炎武、王夫之等清初大儒经世思想中一项突出的内容，即强烈的民族意识。他们挖掘传统儒学中的夷夏观念并加以发挥，形成己说。如顾炎武《日知录》就阐述说：“君臣之分，所关者在一身，华裔之防，所系者在天下。故夫子之于管仲，略其不死子纠之罪，而取其一匡九合之功。盖权衡于大小之间，而以天下为心也。夫以君臣之分，而犹不敌华裔之防，而《春秋》之志可知矣。”^①“严夷夏之防”，这是传统的儒家思想，含有糟粕成分。但由于清初特定的历史环境，在当时民族压迫异常残酷的情况下，这一思想在顾炎武、王夫之及其同时代的众多思想家心目中，可谓根深蒂固。

清初诸儒这种强烈的民族意识，对章太炎儒学思想乃至其整个思想体系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是启蒙了章太炎早年的民族意识。我们从章太炎自订年谱以及其他众多回忆资料中，不时都能看到关于华夷观念对他早期儒学思想的影响的记叙。而这一思想观念的重要来源，除历史古籍外，主要就是清初诸儒的著述。在谈到他民族革命思想的渊源时，章太炎曾反复说道：在外祖父朱有虔影响下，顾炎武、王夫之的《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黄书》等著作使其排满思想常酝酿于胸中^②。二是清初诸儒思想中的这种强烈民族意识，成为他中年以后宣传国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的知识源泉。1901年，章太炎在告谢本师、申斥走革命道路的理由时即援引顾炎武为榜样说：“弟子以治经侍

①顾炎武：《管仲不死子纠》，《日知录》卷七，《日知录集释》，第317页，花山文艺出版社，石家庄，1990。

②参见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第5~6页，中华书局，北京，1979。

先生。今之经学，渊源在顾宁人，顾公为此，正欲使人推寻国性，识汉、虏之别耳！”^①再如他收入《樵书》的《序种姓》一文，不仅在论述历史民族之形成时大量征引了顾、王二氏的原话，而且《序种姓》的中心思想即起源于顾氏：“顾宁人遭东胡乱华，欲综理前典，为姓氏书，先生（指章太炎）仪型宁人，作《序种姓》”^②。

第二，初步的民主思想。批判封建君主专制，是明清之际启蒙思想家经世精神的一大体现。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唐甄等人的思想一定程度上都带有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内容。这些思想尽管还不能与近代民主思想相提并论，但其激烈批判封建专制方面已有接近于近代民主思想之处。正是因此，近代众多思想家都从中吸收“民主”思想的养料。

上述诸人对章太炎的民主思想影响最大的是黄宗羲和王夫之。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继承和发展了先秦以来儒家所倡导的民本传统以及“无君论”、“非君论”等思想，对“君为臣纲”的封建伦理道德进行了猛烈抨击。章太炎在众多论说中吸收和发挥了黄宗羲的这一思想。他在《上李鸿章书》中称黄氏《原君》篇“知君民之分际”、“陈义甚高”。《冥契》篇不仅摘引黄氏《原君》、《原法》、《原臣》等文为论据，而且继承并高度评价黄宗羲的反对封建君主专制思想。倡导个性解放、呼唤“大公之理”是王夫之思想的特色之一。章太炎对王氏最为推崇。他的《藩镇论》、《分镇》不仅在篇末征引王夫之《黄书》中的《古仪》、《原极》诸篇加以推扬，而且其观点“削藩镇以立宪政者，天下之至

① 章太炎：《太炎先生自订年谱》，光绪二十七年，载《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1期。

② 但植之：《蓟汉雅言札记》，《制言》第25期。

公也”，正是对王夫之“大公之理”的直接发展^①。

第三，务实学风。务实致用是清初学风的一大特色。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颜元等人以“经世应务”、“独立求是”的实体实用之学开启一代学风，把中国古代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学术传统贯于实学之中，从学风方面对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做了继承与发展。务实学风深深影响了有清一代的学术方向和学术风格。就章太炎而言，他对务实学风的继承不是株守先儒的一得之见，而是从为学宗旨和精神实质上领会、承接和超越。

兹举顾炎武学风为例。顾炎武学风，简言之就是“博学于文、行己有耻”，要求把踏实而广博的学风与内在的道德修养融为一体，实实在在地实现道德文章的贯通。然而，乾嘉学派除戴震等极少数人外，所承袭者仅在于“博学于文”一端，而舍弃了其“经世致用”的根本精神。康、梁为首的改良派，虽继承了其“以经术影响于政体”的风格，但却失掉了“博学于文”的实证态度。只有到章太炎，才真正全面继承和发展了顾炎武学风。于“博学于文”，章太炎不仅摒弃了宋明理学“游谈无根”的空疏学风，而且改变了汉学末流重考据而轻义理的弊端，对汉学作了发展。于“行己有耻”，他反复宣讲道德修养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在《革命道德说》中，他不仅把顾炎武所提倡的“知耻”、“重厚”、“耿介”等旧道德转化为革命道德，而且提出“必信”作为补充。章太炎晚年的儒学思想受顾炎武影响更为明显，他的《论今日切要之学》、《适宜今日之理学》以及在无锡、苏州等地讲演的一个主题就是弘扬原儒“修己治人”的精神、倡导顾炎武“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学风。

^①章炳麟：《藩镇论》，《五洲时事汇编》第4册。

二 乾嘉学统

从学术史角度考察，章太炎的儒学思想自然与乾嘉学派血脉相承。具体说来，与章太炎儒学思想关系密切者是清代朴学之“正统派”。

梁启超论清学，把全盛期之代表人物惠栋、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名之曰正统派。正统派，实即清代朴学之中坚。章太炎从师俞樾，俞樾又与戴、段、二王一脉相承，章太炎受正统派影响是不言自明的事实。不过，如此论说只是泛泛而言，并无多少深意。实际上，若作具体分析，正统派诸子对章太炎儒学思想的影响在不同时期、不同方面是不一样的，有时甚至出现截然相反的情况。大体上说，这种影响与章太炎儒学思想的演进成一逆序倒溯的关系。

章太炎早年的儒学思想主要受戴震后学的影响。章太炎早年治学，濡染的主要是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戴震后学的遗风。段氏、二王，虽然在考据方法上更加缜密和成熟，并在一些领域取得了超越前人的学术成就，但他们的著作却趋于单纯的考据，在内容上失去了戴震那种反理学的思想精髓，更缺乏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和探讨。正像段玉裁晚年所追悔的那样：“喜言训诂考核，寻其枝叶，略其本根，老大无成，追悔已晚。”^①到晚清，汉学家不仅在学术上走上为考据而考据的末路歧途，而且在思想上也蜕化为保守的学者。章太炎的老师俞樾，就是其中的一位代表。他要求学生无视滚滚而来的社会潮流，“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致力于“稽古之学”，“抱遗经而究终始”，传继

① 段玉裁：《博陵尹师所赐朱子小学恭跋》，《经韵楼集》卷八，第 14 页，经韵楼丛书第 1 种。

往圣绝学^①。章太炎在俞樾指导下完成的《膏兰室札记》和《诂经札记》，便烙有汉学末流的印痕。这两部札记，虽然也有一些独到之见，但零碎缺乏系统性，仅是一般停留在文字校勘的点滴得失上，从整体上看缺乏蓬勃向上的思想气息。

当然，章太炎也继承了段氏、二王等人的优秀成果。他对王氏父子在文字学方面的成就极为推许，曾称说：“高邮王氏，以其绝学释姬汉古书，冰解壤分，无所凝滞，信哉，千五百年未有其人也”^②。章太炎语言文字学方面的代表作如《国故论衡》、《文始》、《新方言》、《小学问答》等，就是在广泛吸收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王念孙《广雅疏证》和《经传释词》、俞樾《古文疑义举例》等学术成就基础上形成的。

章太炎对戴震本人学术成就和学术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则在他中年以后。具体说来，戴震对章太炎学术思想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考据中发展出义理。戴震继承顾炎武、黄宗羲等倡导的由文字音训以明经达道的主张，强调“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由渐”^③，以考据为明道的手段。然而，乾嘉以后，考据学的发展却渐渐疏离了其开创者的初衷，走向了烦琐细碎。章太炎不仅十分重视对戴震义理之学的研究，而且继承其为学精神，写出了像《国故论衡》、《蓟汉微言》、《蓟汉昌言》这样探讨儒学义理的论文。二是社会批判精神。戴震继承并发展了明清之际顾炎武等人的经世特色，能够把说经与社会批判紧密结合起来。章太炎不仅在《清儒》、《学隐》、《释戴》等文中对戴震的反

① 俞樾：《诂经精舍课艺文八集序》，《春在堂杂文六编》卷七，第 5~6 页

② 章太炎：《正名杂义》，《馥书》重订本，《章太炎全集》（三），第 222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③ 戴震：《与是仲明论学书》，《戴震全集》（五），第 2587 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

理学精神表示赞许，而且在《思乡原》上下篇中以宋儒程朱为乡愿，文理逻辑一系于戴氏《孟子字义疏证》，如说程朱理学“兼之老聃也，偏得之孙卿、庄周也”；再如批判攻戴的方东树之流“不悟”，是“猥俗之论”，等等。三是知性精神。论者常引“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等来概括戴震的学术特色，实质上，这是强调戴震治学的知性精神和科学方法。在这一方面，章太炎不仅继承了戴氏的唯物主义精神，发展了戴氏的理欲观，而且与戴氏缜密严谨近似名家的研治小学的方法一脉相承^①。事实上，章太炎在心目中也一直是把戴震奉为“师表”^②，推为“圭臬”的^③。

三 清代浙东学术

论章太炎的儒学思想渊源，不可不提及浙东学派。在《清儒》一文中，章太炎对浙东学派有一精要概括：“自明末有浙东之学，万斯大、斯同兄弟，皆鄞人，师事余姚黄宗羲，称说《礼经》，杂陈汉、宋，而斯同独尊史法。其后余姚邵晋涵、鄞全祖望继之，尤善言明末遗事。会稽章学诚为《文史》、《校讎》诸通义，以复歆、固之学，其卓约过《史通》。而说《礼》者羈縻不绝。定海黄式三传浙东学，始与皖南交通。其子以周作《礼书通故》，三代度制大定。唯浙江上下诸学说，亦至是完集云。”^④章太炎不仅研读过黄宗羲、万斯同、章学诚等人的大量著述，而且曾问学于黄以周，因此，在他身上带有浙东学派的学统。

浙东学派多史学家，以治史著称。在学术思想上，像章学诚

① 章太炎：《清儒》，《馥书》重订本《章太炎全集》（三），第157页。

② 章太炎：《致吴君遂书》，《章太炎政论选集》，第172页，中华书局，北京，1977。

③ 吴承仕藏《章炳麟论学集》，第349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

④ 章太炎：《清儒》，《馥书》重订本《章太炎全集》（三），第157页。

明确提出“六经皆史”的口号，强调学术“经世”、学术面向社会的实际；反对“守六籍以言道”，主张“因史以明道”，扩大了对圣人之道的取证范围，以历史为依据，较之前人具有进步性、合理性。在学术史方面，他系统论述了诸子学说与“六经”的渊源关系，认为“六经皆史，而诸子又皆出于六经”，指出儒家与名家、法家同源。他还根据刘歆《七略》把所谓古者官师合一、诸子出于王官之说加以发扬光大。在研究方法上，他不仅提倡以经治史，而且尝试以治史的方法治经^①。章太炎中年以后虽对章学诚时有微词，但对上述观点他都曾一度接受。章太炎在论及经史关系时就会说过：“经与史关系至深，章实斋云‘六经皆史’，此言是也。”^②他正是接过章学诚的“六经皆史”，提出了“经就是古人的史，史就是后世的经”^③，并赋予“六经皆史”以近代含义。在儒家与诸子的起源问题上，我们从《榘书》、《论诸子学》中不难见到章学诚对章太炎的影响。章太炎宗古文，对秦汉学术史的看法也有与章学诚一致之处。如章学诚推崇刘歆，而章太炎竟至刻一图章自称“刘子骏私淑弟子”。

此外，像浙东学派不拘牵于汉、宋门户，宗陆、王，考据与义理并重等，在章太炎的儒学思想中也有所反映。章太炎浓烈的民族意识，固然系受顾炎武、王夫之思想的影响，但也与浙东学术的熏染有关。梁启超说：章太炎“本是考证学出身，又是浙人，受浙东派黄梨洲、全谢山等影响甚深，专提倡种族革命，同时也想把考证学引到新方向。”^④梁氏道出了章太炎与浙东学派的关系。

① 可参看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69～7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② 章太炎讲，诸祖耿记《历史之重要》，《制言》第55期。

③ 章太炎：《经的大意》，《章太炎的白话文》，第70页，上海泰东图书局，1921。

④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37页，东方出版社，北京，1996。

四师友的影响

章太炎的儒学思想还直接受到师友学术思想的影响。俞樾、孙治让、黄以周、谭献、高学治等晚清经儒都曾不同程度地对章太炎进行过帮助和指导。

章太炎从师俞樾问学七年，言传身教，获益良多。章太炎受俞樾影响最大的方面自然是前面提及的乾嘉汉学的治学传统。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诸子学研究。俞樾考治诸子，虽是出于考证经义的需要，服务于经学研究，但却推动了诸子学研究之风的兴起。这一点对章太炎的学术思想影响较大。章太炎不仅在诂经精舍时期直接在俞樾指导下围绕周、秦、两汉诸子著作进行了系统学术训练，写出了像《膏兰室札记》这样的学术专著；而且诸子学研究成为他一生治学的一个重要方向。如果追溯诸子学研究对章太炎儒学思想的影响，不能不论及此。还有，俞樾治经，兼采今文，这在章太炎早年的学术研究中也有反映。如章氏的《春秋左传读》就明显采纳了公羊学说。

孙治让是晚清与俞樾齐名的经学大师，主要著作有《周礼正义》、《墨子间诂》、《尚书骈枝》、《契文举例》、《名原》、《札迻》、《古籀拾遗》等。章太炎对孙氏的学术贡献评价极高，称孙治让治朴学“精专足以摩挲姬、汉，三百年绝等双”^①。《周礼正义》乃集前人研究《周礼》之大成的精湛之作，章太炎誉之为“高文典册，蔚为国光”，“古今言《周礼》者莫能先也”^②，对其推崇有加。《墨子间诂》是晚清子学研究的力作，章太炎认为它的问

① 章太炎：《孙治让传》，《太炎文录初编》卷二，《章太炎全集》（四），第 213 页。

② 章太炎：《孙治让传》，《太炎文录初编》卷二，《章太炎全集》（四），第 213 页。

世推动了墨学的复兴，结束了“儒术孤行”的局面，馨及后世古代思想史的研究。孙、章二人同属于一个学派，章太炎对孙氏如此推隆，受其影响不可避免。

具体说来，从时间上讲，戊戌维新时期章太炎受孙诒让影响较大。这一时期，正是章太炎儒学思想的形成期，当时，他已告别经舍，在一系列重要学术观点和学术思想上都受益于孙氏。俞樾治学受宋翔凤、廖平影响，尊《公羊》而彰《王制》，不以《周官》为周公之书，且“说经好改字”^①，这一切在章太炎早年的儒学思想中都有所反映。戊戌时期，章太炎一改杂糅今、古文的做法，固持古文家法，且在学风上趋于严谨征实，其直接原因即源自孙诒让的学术影响。这从当时章、孙二人的多通书信中不难看出。在研究内容上，孙诒让的《周礼》、《墨子》以及文字学研究成就对章太炎影响最大。章氏对古代典章制度的驾轻就熟，对古代礼法的重视，是和孙诒让《周礼正义》对他的影响分不开的。孙诒让引墨入儒，借以补弊扶偏，以墨行来砥砺品行，挽救世道。章太炎援此为同道，他在晚年的讲演中就曾发扬《墨子间诂》的思想：“近人病儒者之柔，欲以墨子之道矫之，孙仲容先生首撰《墨子间诂》以为倡”^②。在文字学方面，不仅章太炎的《新方言》直接得到了孙氏的指教，而且正是读了孙氏《名原》以后，章太炎改变了对甲骨文严斥固拒的态度。总之，章太炎既然称“海内奇硕，自德清、定海二师下世，灵光岿然，独有先生”^③。他受孙诒让影响至深当无疑问。

章太炎早年还会向黄以周、谭献、高学治等著名学者问学。

①章太炎：《俞先生传》，《太炎文录初编》卷二，《章太炎全集》（四），第21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②章太炎：《儒行大意》，《国学商兑》第1卷第1期。

③章太炎：《与孙仲容书》，《太炎文录初编》卷二，《章太炎全集》（四），第163页。

他们不同程度地对章太炎儒学思想的形成产生过影响。黄以周博览群经，尤以礼学见长。他以毕生之力，撰成《礼书通故》百卷，“凡详考礼制，昼夜研索，多正旧说之误，释后人之疑”^①。章太炎称赞这部书“盖与杜氏《通典》比隆，其校核异义过之，诸先儒不决之义，尽明之矣”^②；称赞其学问“研精故训而不支，博考事实而不乱，文理密察，发前修所未见，每下一义，泰山不移”，在晚清堪与俞樾、孙诒让鼎足而三^③。章太炎重视“三礼”，治学严谨，和黄以周的熏染是有关的。谭献治经倾向于今文经学，并以文学见长。章太炎曾多次登门受教，并将自己的《春秋左传读》等著述呈览，请他“指其疵垢”^④。谭氏文章具有魏晋风格，“于绮丽丰缛之中，存简质清刚之制，取华落实，弗落唐以后窠臼”^⑤。章太炎文风由追法秦汉文章改为效法魏晋风格，正是源于此。高学治一生勤于治朴学，曾和章太炎的父亲同在诂经精舍共职。章太炎严谨朴实的学风和高洁正直的学术操行都受过他的影响。他曾对章太炎说：“惠、戴以降，朴学之士，炳炳有行列矣；然行义无卓绝可称者，方以程、朱悦也。视两汉诸经师，坚苦忍形，遁世而不闷者，终莫能逮。夫处陵夷之世，刻志典籍，而操行不衰，常为法式，斯所谓易直弼中，君子也。”

① 缪荃孙：《黄先生墓志铭》，《清代碑传全集》，第 1195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② 章太炎：《黄先生传》，《太炎文录初编》卷二，《章太炎全集》（四），第 214 页。

③ 章太炎：《说林下》，《太炎文录初编》卷一，《章太炎全集》（四），第 119 页。

④ 章太炎：《致谭献书》，见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第 31 页。

⑤ 钱基博：《复堂日记补录·序》，见谭献《复堂日记补录》，《念劬庐丛刻初编》第 2 册。

小子志之！^① 这种德、才相长的教育对日后章太炎成为一个卓越的学者和思想家功不可没。

第二节 子学、佛学、西学的汇入

章太炎的儒学思想不是对传统儒学的简单继承，而是在发展和改造传统儒学的基础上形成的。在这一形成过程中，子学、佛学、西学的作用不可低估。它们虽然不是章太炎儒学思想的正宗源头，但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由于它们的旁路楔入，才使得章太炎独具特色的儒学思想形成成为可能。

一 “摭拾诸子”

诸子活跃于先秦，但诸子学却兴盛于晚清。在晚清，无论是陈澧、王先谦、俞樾、孙诒让等传统学者，还是谭嗣同、梁启超、严复等后蒙思想家，都十分注重诸子学的研究。受时代风气熏染，章太炎对诸子学研究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取得了巨大成就。

章太炎所论的诸子学，与乃师俞樾不同，是指包括儒家孔、孟在内的周秦诸子的思想学说。为了论述的方便，我们这里的“诸子”，特指先秦时期的非儒学派。大体上说，章太炎研究诸子学说、吸收诸子思想，对其儒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以下影响。

第一，通过子学研究，援子学考释儒学，重新估定儒学的历史价值。

子学复兴的原因之一，便是为重现儒家经典的历史真面目提

^① 章太炎：《高先生传》，《太炎文录初编》卷二，《章太炎全集》（四），第 210 页

供证据。由于子书成书年代接近于“六经”，故受清代汉学家重视。章太炎继承了前人援子书考证儒经的做法，他沿着王念孙、俞樾等人的考据之路所成的《膏兰室札记》便是这一方面的作品。《札记》虽以诠释考辨诸子著作为主，但从其中 80 余条考释《诗》、《书》、《礼》、《易》、《春秋》的条文中，不难看出他早年以子证经的努力。

章太炎以子证经的特色在于，他不是停留在王念孙、俞樾等人对儒家经典文字章句的校勘考释水平上，而是由考据上升到义理，力图从义理方面援引诸子来重新诠释儒学。他在这一方面的代表作，当推《齐物论释》。章太炎作《齐物论释》，认为“能上悟唯识，广利有情，域中故籍，莫善于《齐物论》”^①，于是以佛解庄，用唯识论讲解《齐物论》。进而，以佛、庄证孔，提出“儒、墨诸流，既有商榷”，就像先秦时老、庄抨击儒、墨一样，他对儒、墨之说多所表异。章太炎拿庄子“内圣外王”来衡量释、老、孔诸家，认为佛家“出世之法多，而详于内圣”，只能用于陶冶情操、培养道德；老、孔“世间之法多，而详于外王”，只可用于理政^②。庄子地位居于孔子之上。这一评论具有反封建的意义。民国以后，章太炎转向积极肯定孔子，对他的援引佛、庄释孔的手法仍不能放弃，曾说：“自内所证，仲尼与老庄一也”；“孔氏绪言遗教，辞旨闳简，庄生乃为敷畅，其文总纘于彼，而成文于此。”^③竟说庄子之学是对孔学的发挥。他对他的“以庄证孔”颇为自得，称“以庄证孔，而‘耳顺’、‘绝四’之指，居然可明”，^④

① 章太炎：《齐物论释定本》，第 63 页，《章太炎全集》（六），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② 章太炎：《蓟汉微言》，第 26 页，1916 年北京铅印本。

③ 章太炎：《蓟汉微言》，第 32 页。

④ 章太炎：《蓟汉微言》，第 87 页

又如，他对“忠”、“恕”的解释。他先是“以庄证孔”，指出《三朝记》所言“忠”、“恕”实即实现“不以一型镕铸”的方法论，“不以一型镕铸”即是不强求齐一的自由主义观。他认为，能够理解孔子“忠”、“恕”涵义的只有庄子——“体忠恕者，独有庄周《齐物》之篇，恢诡谲怪，道通为一”^①。稍后，他又对孔子的“忠”、“恕”作了进一步解释，认为“忠”、“恕”可以为学，“举一隅以三隅反，此之谓恕，……专用恕术，不知亲政，于事理多失矣，救此失者其唯忠。忠者，周至之谓，检讎观察必微以密，观其殊相，以得环中，斯为忠矣”^②。章太炎把“恕”理解为演绎、推理，把“忠”解释为归纳，实质是用墨子、荀子的名学来解释孔子之道，从而将一般人认为只有伦理学意义上的“忠”、“恕”，赋予了逻辑学、认识论的意义。经此解释，诸子学与孔学会通、融合了。

再者，他还以诸子学说为论据来揭掉儒家的神圣面纱。在《论诸子学》中，他考迹诸子的源流，指出诸子学源出于老子，“儒家、法家皆出于道”，老子“本是史官，知成败祸福之事悉在人谋，故能排斥鬼神，为儒家之先导”。章太炎由对经学文字章句的考据转变为对诸子学义理衍变和历史事实的考证，虽有失误之处，但从整体上说，对于较为客观地展现儒学历史原貌、重新评定儒学价值、打破儒学独尊地位还是起了较大推进作用的。

第二，通过调整经学与子学的关系，打破儒家传统的限囿。

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经学与子学、儒家与诸子一直处于不平等地位，经学与儒家的地位被封建统治者故意拔高，而诸子的地位则受到贬斥。为了打破儒学一统天下的局面，章太炎对诸子学和儒学的关系进行了新的论证。

① 章太炎：《订孔下》，《检论》卷三，《章太炎全集》（三），第 427 页。

② 章太炎：《蓟汉微言》，第 31～32 页。

在学术上，章太炎努力使子学摆脱经学的附庸地位，成为独立的学术形态。在这一方面，他不仅脚踏实地地写出了像《原道》、《原名》、《原墨》、《原法》、《诸子学略说》、《齐物论释》、《庄子解故》、《管子余义》等专门研究诸子学的论著，而且从理论上呼吁诸子学应作为独立的学术领域。如他的《论诸子学》就主张把经学与诸子学并列，认为说经之学是客观之学，“惟是考其典章制度与其事迹而已，其是非且勿论也”；而诸子学则不然，“彼所学者，主观之学，要在寻求义理，不在考迹异同”^①。他在《国学振起社讲义》及《教育今语杂志章程》中明确宣布，诸子学是国学家族中与群经学、文史学等并列的一大门类，甚至在《致国粹学报社书》中称诸子学为“光大国学之原”^②。章太炎的这一努力得到了时人的认可，像胡适就曾指出：“到了最近，如孙诒让、章炳麟诸君，竟都用全副精力发明诸子学，于是从前作经学附属品的诸子学，到此时代，竟成专门学”^③。与此相应，他一改清代多数学者把孔孟学术上升为“经学”、论诸子不涉及孔、孟的做法，把孔、孟纳入诸子学的范畴，以平等的眼光看待先秦各家，可以说，章太炎提高诸子学地位的努力，对其儒学思想的演变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在思想上，他通过重新评价诸子来打破孔子及儒学的独尊地位。章太炎敢于从历史出发，打破儒学一统的局面。如在《实学报》上发表的《后圣》、《儒道》、《儒法》、《儒墨》、《儒侠》等文中，他把法家的富强之术、墨家的“艰朴”“兼爱”、道家的智谋、侠家和兵家的“勇”“气”作了肯定的评价，认为这些都是

① 章太炎：《论诸子学》，《章太炎选集》，第 357～358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② 章太炎：《致国粹学报社书》，《章太炎政论选集》，第 498 页。

③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第 9 页，商务印书馆，北京，1987。

儒家的短缺之处，可以补儒家之不足。在诸子学研究中，对孔子及儒学地位冲击最大的是章太炎对庄子的评价。辛亥革命时期，《庄子》在章太炎心目中居于崇高地位。他指出：“若夫九流繁会，各于其党，命世哲人，莫若庄氏：《逍遥》任万物之各适，《齐物》得彼是之环枢，以视孔、墨，犹尘垢也。”^①正是出于对《齐物论释》“自在而无对”“咸适而平等”“不齐而齐”等思想的推崇，章太炎“为二千年来儒墨九流破封执之肩”^②，把文（王）、孔、老、庄并列为“域中四圣”^③，甚至扬庄抑儒。综观章太炎的整个学术思想不难断定，他对孔子及儒学的评判与对诸子的评价息息相关。

二 摄取佛学

“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④。章太炎最初接触佛学是在戊戌变法时期。当时，受夏曾佑、宋恕等人的影响，他“略涉《法华》、《华严》、《涅槃》诸经，不能深也”^⑤。直到1903年，他因《苏报》案入狱，得以认真系统地学习佛法，“晨夜研诵，乃悟大乘法义”^⑥。从此，他一改过去排斥佛学转而拥护、利用佛学。1906年他东渡日本后，不仅研读了大量的佛学典籍，而且发表了系列阐释佛学的论文，并以佛学为武器宣传革命思想。他的佛学思想走向成熟。章太炎对他本人的习佛历程曾有一番精要的概括：“余少年独治经史通典诸书，旁及当代政书而已，不好宋学，尤无意于释氏。三十岁顷，与宋平子交，平

① 章太炎：《庄子解故》，《章太炎全集》（六），第127页。

② 乌目山僧：《齐物论释·后序》，《章太炎全集》（六），第58页。

③ 章太炎：《蕲汉微言》，第38页。

④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9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⑤ 章太炎：《太炎先生自订年谱》，光绪二十三年。

⑥ 章太炎：《太炎先生自订年谱》，光绪三十年。

子劝读佛书，始观《涅槃》、《维摩诘》、《起信论》、《华严》、《法华》诸书，渐及玄门，而未有所专精也。遭祸系狱，始专读《瑜伽师地论》及《因明论》、《唯识论》，乃知《瑜伽》为不可加。既东游日本，提倡改革，人事繁多，而暇辄读藏经，又取魏译《楞伽》及《密严》诵之，参以近代康德、萧宾诃尔之书，益信玄理无过《楞伽》、《瑜伽》者。^①在佛学各门各派中，章太炎看中的就是华严宗、禅宗、法相宗。而三者之中，他尤其推重法相宗。

法相宗创自唐代的玄奘及其弟子窥基。该宗着力于分析世界各种现象（万法），强调“万法唯识”，认为一切现象都是“识”所变现出来的。法相唯识宗继承了印度瑜伽行学派的唯识说，用八识（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末那识、阿赖耶识）、三性（遍计所执性、依他起性、圆成实性）、四分（相分、见分、自证分、证自证分）来解释世界的本原和构成。章太炎一度接受法相唯识宗的八识、三性、四分说作为自己哲学体系的理论基础。

章太炎之所以宗奉法相唯识之学主要是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但与他的儒学思想也有一定的渊源关系。一是唯识论烦琐的名实之辨与朴学缜细的名物训诂考据有着相似之处。对此，章太炎自己也承认：唯识论“以分析名相始，以排遣名相终，从入之途，与平生朴学相似，易于契机”^②。二是唯识论的缜密思辨与汉学相似。他曾解释说：“仆所以独尊法相者，则自有说。盖近代学术渐趋实事求是之途。自汉学诸公分条析理，远非明儒所能企及，逮科学萌芽，而用心益复缜密矣。是故法相之学，于明代

①章太炎：《自述学术次第》，《制言》第25期。

②章太炎：《蕤汉微言》，第72页